ATLANTIS PRESS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CMETIE 2020)

The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ment's Coping Strategies by the Social Protests in the Internet Era

JiaHao Wang[1,a,*]

[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a]email: 2900863474@qq.com

***Corresponding author: JiaHao Wang**

Keywords: Internet era, government, social struggle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strategies of the government to deal with the social protest events have been changing, a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et era, social protest events have eliminated the government's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the protests, such as "pulling out the nails", "opening the way" and other traditional response actions can not play the previous role. The government began to reflect on its traditional coping strategies, formed a set of "rigid and soft" network governance model, and reconstructed the coping strategies after digestion. With the "civilized net action" of the movement type, the appeara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new media of government affairs, the help of network groups such as "people in truth" and "little pink" has regain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matter of resistance to some extent.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抗争对政府应对策略的消解与重构

汪佳豪 [1,a,*]

[1]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昌，江西，中国

[a]email：2900863474@qq.com

***通讯作者:汪佳豪**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 政府 社会抗争

摘要：政府应对社会抗争性事件的策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并且有其变化的内在逻辑。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抗争性事件使政府应对抗争的策略发生了消解，传统的应对行动发挥不了先前的作用。政府开始对其传统的应对策略进行反思，形成了一套“刚柔并济“的网络治理模式，对消解之后的应对策略进行了重构。以运动式的“文明净网行动”、大量政务新媒体的出现、“理中客”“小粉红”等网络群体的助力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夺回了在对抗争性事件上的主导地位。

一、前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兴社会空间和各种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也推动了国家政权建设和制度的转型。以及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国权力在不同领域的收缩和扩张，都不同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的矛盾。由此中国的社会抗争性事件数量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社会抗争性事件似乎作为中国转型发展

Copyright © 2020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的阵痛，成为政府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一道难题。

政府对抗争事件的应对策略，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变化的状态。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其作为一种抗争的工具，使民众拥有了更多的发声的机会。政府一度难以适应这种变化而时常陷于两难的境地。但与此同时，这也倒逼着政府对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反思。造成了政府对社会抗争的传统的应对的重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谈的社会抗争特别指向与政府相关的民众的诉求，所以文中所谈及的政府的应对策略也特指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上使用的政治性手段。本文就试图通过三个案例展示不同时期政府对于社会抗争性事件的应对策略，找出其应对策略的变化，并试图分析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抗争对政府应对策略的影响。

二、关于社会抗争的文献回顾

学术界在社会抗争方便成果丰硕，大致可以分为几类。首先是站在策略的视角探讨社会抗争，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在马来西亚小渔村的田野调查中就发现了底层民众常以“偷懒”、“开小差”、“暗中破坏”、“诽谤”等形式进行抗争，由此提出了“弱者的武器”这一概念[1]。在我国也有大量的关于社会抗争的策略性研究，有于建嵘就提出的“以法抗争[2]；朱建刚提出的“以理抗争”[3]；王洪伟提出的“以身抗争”[4]等。也有学者针对互联网时代提出“民间新闻发布会”的抗争策略[5]。

二是站在社会动员的视角探讨社会抗争，这里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情感与理性两条路径。以情感为代表的社会抗争理论我们可以追溯到勒庞的情感主义路线，他认为将抗争者视为“群氓”或“挣脱了锁链的民众”，提出个体聚集时会有不同于正常时刻的情感喷发，如“愚蠢、偏执、专横、人云亦云”等[6]。贾斯珀[7]、古德温[8]、马库斯、卡斯特尔[9]等人也强调了情感在社会抗争中的作用。奥尔森运用“理性人”假设解释了个人偏好与政府公共选择的关系，解释了群体的“理性导致的非理性”行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直接影响了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视角 的转变，使得研究者把目光从情感转到理性。麦卡锡和扎尔德提出了资源动员理论，他们从“理性人”假设出发，主张社会运动发生的关键在于能否调动足够的资源以及获得足够的收益。在中国杨国斌教授就将悲情、戏谑成为解读抗争动员的主要视角[10]。在杨国斌教授之后还有王谦秋将怨恨加入了情感动员的影响因素[11]，谢金林将愤怒加入了情感动员的影响因素[12]。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开始探讨国家策略对社会抗争行动的影响。应星关于大河移民抗争极为精彩的民族志研究，生动地展现了基层政府拔钉子、开口子和揭盖子的摆平术[13]。还有学者发现国家针对社会抗争所使用的不同的策略也深刻的影响着民众社会抗争的行为[14]。

从以上关于社会抗争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外关于社会抗争的研究多集中在抗争策略及抗争动员这两方面。在社会抗争与政府应对策略方面的研究上，也大多是从单个案例出发探求政府的策略对抗争活动的影响上。缺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抗争形式的变化对政府应对策略的影响。本文就试图通过三个案例展示不同时期政府对于社会抗争性事件的应对策略，找出其应对策略的变化，并试图分析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抗争对政府应对策略的影响并找出政府应对策略变化的逻辑。

三、大河移民上访事件

大河移民上访事件讲述的是由于水库移民问题，平县山阳乡的农民在长达 20 多年的时间里进行移民上访的故事。在这一过程中移民的上访与政府的摆平不断地交锋。山阳乡大河移民上访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抗争性事件的一个典型的代表。纵观移民上访的整个过程，其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对于社会抗争性事件的应对策略。

中国从 1949 年以来建立起了独特的科层制。但是这种制度的形成却在中国基层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究其原因还是其与治理现实的不符，于是在基层社会就形成了许多变通的手

段去抵消这种矛盾，而这种非正式的策略往往是更有效的[14]。政府的这些非正式的应对策略，恰恰展现了那一时期中国政府对社会抗争性事件的应对策略的特点。同时中国从 1949 年以来建立的这种独特的科层制度也体现了中国至上而下的权力的运行特点，正是基于这样的权力运行特点，当时大河移民采用了上访的形式进行社会抗争。与大河移民上访同时发生的还有政府对此的应对策略。

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政府的应对策略主要有这么几种。一是针对集体上访中的精英，政府通常会集中应对上访的组织者。第二是用非例行化的手段去处理上访事件。应星将其称之为“开口子”，“开口子”尽管可能构成对权力的微观反抗，但“开口子”后高层政府就能将“暖流”汇入上访民众心中，以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来实现平息抗争的目的。第三种应对策略，应星将其称之为“揭盖子 ”。通过树立曝光的靶子来重建民众对国家足以自律自洁的信赖。大河移民的社会抗争事件的最终解决，就是政府对上三种策略的灵活运用。但在这一时期，互联网还没有进入中国。大河移民在抗争中，并没有互联网的参于。这样政府的传统的应对策略，只要运用得当，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在互联网进入抗争者的视线之后，情况还会是这样吗？

四、厦门 px 事件

2007 年厦门市民针对厦门 px 项目，发起了社会抗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抗争事件的发端起于互联网，并且最终通过抗争改变了政府的决策。事件是从厦门本土的专栏作家连岳的博客和厦门本地最具影响力的网络论坛“小鱼社区”和房地厂联合网，针对厦门 px 项目的曝光开始的。随后大批的厦门市民通过网络表达反对 px 项目，与此同时网络中出现了大量由厦门民众组织的网络社区对这一事件展开了积极的讨论。之后由于一则在厦门民间有关到市政府“散步”的号召的流传，厦门市政府紧急叫停了 px 项目。之后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了再次环评，特别还在厦门网开通了针对 px 项目的投票活动，在一天内有六万人参加网络投票。反对者占了 94%，随后厦门市政府紧急关停投票通道。事件最终以厦门市政府迁离 px 项目告终。

由于整个抗争行动大多发生在网络上，厦门市政府的应对手段显得极为有限。纵观整个事件中的厦门市政府应对策略主要有这么几个。首先是关停一些网络论坛。其次是鼓励公众通过网络向有关部门提意见以及开通民众投票通道。但这两项举措都成效见微。

从厦门 px 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抗争运动的过程实质是由民众所主导的。原因正是由于互联网的抗争的介入。而厦门市政府采取的应对策略还是传统的应对策略的思维方式，在这一时期的许多社会抗争性活动都呈现出这样的特点。这里也显现出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抗争活动对政府传统的应对策略产生了消解的作用，而政府处于社会治理角度的考量，也必然会对传统应对模式进行反思。

五、2013 年夏俊峰案

2013 年 11 月针对夏俊峰案件的审理过程，网上出现对城管部门执法弊端不满的声音。但这是政府的应对策略却不像以往那样被动。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空间中的“理中客”以理性的角度与网络中怨恨的声音产生了交锋（这里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理中客”等群体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至 2010 年以来政府开展的运动式的“文明净网行动”）。伴随着“理中客”群体的发声，各级政务新媒体随即开始发声支持。在网络中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这也是这次事件未能造成巨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从这次事件看出政府对于社会抗争的应对策略发生了消解之后的重构，由于政府运动式的文明净网行动，政府在面对抗争性事件时再也不是一个人战。政府就通过运动式的“文明净网活动”使互联网中出现了大量支持性的网民。并且各级政务新媒体也主动出击，不再使政府处于被动的状态。两者形成合力与网络中的抗争行动交锋，使之难以形成一边倒的态势，将

社会抗争行动控制在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

其实不止于此，根据人民网 2013 年的舆情报告，中国互联网治理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刚柔并济的治理思路。这里也显示出政府对于社会抗争性事件应对策略的重构。总的来说有这么几方面，首先以运动式的“文明净网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确立了政府的主体地位。第二各级政府开设政务新媒体，使政府重新占据了一定的宣传阵地。第三以“理中客”、小粉红“为代表的网络群体对网民的态度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也说明政府的”文明净网行动“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虽然政府还是有如“拔钉子”式的打压大 V、删帖等应对方式。但与之对应形成的刚柔并济的互联网治理模式，正是政府面对互联网时代的抗争性事件，其应对策略消解重构的直接表现。

六、讨论与总结

政府应对社会抗争性事件的策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并且，有其变化的内在逻辑。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抗争性事件使政府应对抗争的策略发生了消解，如“拔钉子”、“开口子”等传统的应对行动发挥不了先前的作用。政府开始对其传统的应对策略进行反思，形成了一套“刚柔并济”的网络治理模式，对消解之后的应对策略进行了重构。以运动式的”文明净网行动“、大量政务新媒体的出现、“理中客”“小粉红”等网络群体的助力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夺回了在因对抗争性事件上的主导地位。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与之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并且在新的问题也在不断的出现。政府重构之后的应对策略是否能从根本上正真消解社会抗争性事件，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未知数。

References

[1] Scott, James. Moral economics of the peasantry: resistance and survival in southeast Asia. Trans. Chen lixian. Nanjing: yilin press.2001.

[2] Yu jianrong.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current farmers' rights protection activities [J]. Sociological research, 2004(6), 49-55.

[3] Zhu jiangang. Rational struggle: strategies of urban collective action -- a case study of the rights of owners in nanyuan, guangzhou [J]. Society, 2004(6), 24-41.

[4] Wang hongwei. Analysis on the validity and limit of "personal struggl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underclass society: enlightenment of an "AIDS villager" fighting for their rights [J]. Society, 2010(2), 215-234.

[5] Le pen, gustave. The mob: a study of the mass psychology. Trans. Feng keli.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2005.

[6] Yang guobin. Grief and banter: emotional mobilization in network events [J].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journal, Hong Kong, 2009(9), 39-66.

[7] Wang qian-qiu, from zhou jiu-geng to Yang dacai: a study on the discourse of resistance in the human flesh dispute, China media report, 2013(3)

[8] Jasper, J. M.(1998).The Emotions of Protest: Affective and Reactive Emotions in and around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Forum . Vol.13(No.3)，397-424.

[9] Marcus, G. E.(2000). Affective Inteligenceand Political Judgment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0] Castells, M.(2012). Networks of Outrageand Hope : Social Movement sintheInternet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1] Xie jinlin, emotion and online protest mobilization: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shishou incident in hubei provin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2(1), 80-93.

[12] Ying xing, "the story of a great river immigrant petitioning", Beijing: life, reading and xinzhi sanlian bookstore, 2001.

[13] Huang weiping, Chen jiaxi, local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urban movement, southeast academic,2008(6),59-66.

[14] Ying xing, "the story of a great river immigrant petitioning", Beijing: life, reading and xinzhi sanlian bookstore, 2001.